

绪 论

—

国际关系史是史学领地中的一大板块，在世界人文科学研究大系中占有突出地位。由于正确导引国际关系的运行，具有制衡世界发展、调节各国关系、化解国际矛盾、维护人类和平、推动文明进步，以及对各国政府抉择对外政策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这门学科诞生伊始，在国际学术界便备受青睐，对其研究代代继起 历世不衰。

学习和研究国际关系史首先应弄清何谓国际关系，关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未形成一种为社会科学界普遍认同的权威定义。原因在于国际关系史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中外从事与国际关系史相关联、相交叉学科研究的学人们（如法律学、经济学、军事学、政治学、哲学等等）均分别以不同的思维方式 从不同的研究视角、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甚至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国际关系的涵义作出自己的诠释 因而见仁见智 表述各异（这里不加列举）有的言之在理，有的过于偏颇。对此不加分析的全面肯定固然不对，完全

否定亦不可取。这里，我们在借鉴上述各家关于国际关系内涵表述有用成分的基础上，专从历史的角度纵横审视国际关系史演进的规律、特点及其运行轨迹，对国际关系涵盖的内质作出以下界定。国际关系是指国际社会中各地区、各国家、各国际组织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思想、教育、宗教和民族等领域中相互交往、相互依存、相互冲突、相互制约的关系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结果的总和。

二

国际关系的肇始历史久远，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了私有制，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出现之后，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便已发生。起初是邻国之间、进而扩展为地区性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多种交往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古代中世纪的国家交往关系仅仅是国际关系的最初形态。因为古代国家尚不具备主权属性，而国家主权是国家最重要的属性。所以，只有当国家具有了主权地位，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所体现出的关系才是平等互惠和无从属的关系。由此，主权国家构成了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

古代和中世纪的国际关系，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交往和联系一般只表现出松散的、偶然的、单一的、局部的特征，当时的国家交往格局还未构成全球性的国际关系。这种非完整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特征是由那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古代和中世纪早期，交通和通讯手段极端落后，阻隔了各国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仅以中国明朝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航行至非洲东岸，一次航程竟耗时 1 年时间为例，足可证明当时国家间联系何其困难。那时绝大多数国家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环境中处于坐井观天，孤居闭塞的状态。连一个地区也不能完全相互沟通，更不用说与其它大陆的接触与交往。近代以前国家的联系主要内容是领

土的兼并 财富和人力的掠夺 征服和反征服的活动。国家的疆域变幻无常 甚至无确定国界。因此 无论是奴隶制时代还是封建时代，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战争关系。在古代早慧的亚洲国家也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机构。在文明起源很早的古代罗马，外交事务被僧侣控制在手。那时有限的外交使节活动，不是化干戈为玉帛 而主要是为战争服务的。

国际关系的内涵深化和外延扩大与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相适应。也就是说国际关系是依赖于经济基础的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只能在人类社会迈入世界近代门槛后才可能产生。15~16 世纪人类社会冲破欧洲中世纪晚期神权统治的禁锢 文艺复兴运动横扫欧洲 国际局势为之一变。特别是地理大发现以后，大西洋市场和东方市场逐步形成，世界加快了由分散到整体发展的步伐，资本主义渐次成长壮大。资产阶级奋起反抗，纷纷战胜封建专制统治。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解放 并发生质的飞跃 大工业开始萌生、勃起 形成规模。大量的产品对外寻求市场，大工业本身也要求取得世界各地的原料资源。贸易范围的不断扩展，刺激了世界市场的成熟。加之通讯和交通工具的逐步改进 促使各国、各洲之间政治、经济联系日趋广泛 社会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与此同时，世界列强也纷纷向海外拓殖地盘 侵占瓜分落后地区 从而把落后国家与地区卷入世界市场的漩涡。全球终于形成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从此全球性的国际关系体系宣告形成，任何地区或国家发生重要事态都会影响或牵动国际关系的全局。

人类历史迈入近代社会，完全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便呈现出若干新的特征。

首先 资本主义力量在各国相继战胜封建制度的过程中 建立起独立的主权国家，古代国家间关系被近代以主权国家的基本参

与者的国际关系所取代，主权国家成为国际关系至高无上的、独立的行为者。尽管完全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亚、非殖民体系的彻底崩溃才得以最终形成，但是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中独立主权国家的相继诞生、毕竟是近代社会以前国际关系中所不曾有的新现象。

其次，近代时期国家间产生相互依存，即冲突与合作同在的局面。经济活动是国际关系运作的动力源泉。任何一个国家商品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它国家的协作，从而在生产与销售，生产国与原料供应国之间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各国无论自觉与否，都产生了合作的需要。当然，经济活动中各国又存在利益的冲突。既合作又冲突构成国际关系中矛盾的统一体，成为近代国际关系史中又一显著的特点。

再次，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演进，主权国家作为国际关系唯一的行为主体被打破。行为者日益增多，行为日益多样化。次政府和非政府的活动逐步上升，各种政府间和非政府性的国际组织不时地扮演着国际行为者的角色，对国际关系的进程发生重要影响。同时主权国家这个国际社会的传统行为者在国际交往中所使用的手段也趋向多样化。各国政府在发展其对外关系时，往往交替运用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宗教的、暴力的与非暴力的、公开的与秘密的等各种手段，国际舞台风云像万花筒一样变幻莫测，使得国际关系的内涵变得更加深刻复杂。

又次，经济关系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基础，近代社会商品经济的生产，紧紧依附于市场的需要，造成市场容量的增大。随着大工业的出现，商品生产越出国境，通过国际分工、国际交换，使一国的经济活动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经济活动成为推动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三

近代国际关系史的产生与发展大体与世界近代史同始同终。近代国际关系史与世界近代史紧密联系、互相渗透。从两者之间的原始关系上看，近代国际关系史是世界近代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者以后者为载体。当近代国际关系史从世界近代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后，又是对世界近代史中国际关系史这部分内容的丰富、深化与扩展。两门课程各有侧重，也各有不同的研究对象。世界近代史以研究资本主义的兴起、发展、壮大、成熟为主线，着重把握历史的总体及整体的发展与规律，阐述国家和民族间内部发展的历史。而近代国际关系史主要是研究国家和民族间外部动态发展的历史，着重从横向方面剖析各个历史时期主要国家间和国际组织的外部关系，阐释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兴衰流变、联系交融及其对全球社会发展过程的牵制和影响。具体说来，近代国际关系史应主要研究：

国际政治关系。国际关系中一切多层次、多方位的复杂关系通常集中反映为政治关系。因此，国际关系史主要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发生、发展、嬗变的历史。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各种国际组织之间的政治关系，并且国家间政治关系的调节越来越求助于各类世界组织，求助于区域性的国际组织。

国际经济关系。国际经济关系是国家间关系的基础，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最活跃的关系。鉴于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已与各国内部社会稳定、政权巩固、福利改善休戚相关，因而国际经济关系在国际关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商品经济依附着市场，商品生产造成市场容量的增大，并随着大工业的出现而越出国外，通过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货币汇率的变换，形成生产、流通、消费关系的国际大循环，使一国的经济活动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

分 并构成国家间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 它影响着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发展。因此,国际关系史研究要以经济关系为基础来探索政治关系的发展 寻找其原因 分析其结果。只有既重视国际政治关系的研究 又重视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 并把两者结合起来 才能真正把握国际关系史的实质。

国际文化关系。欧美国际关系史专家指出,体现国际关系史面貌的不仅仅是国家之间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意识形态交往的关系,还有文化的交往关系。国际间频繁的文化交流不仅促进了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同时也充当了加强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联系的媒介,由此构成了国际关系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文化关系。国际间的文化关系是早已存在的事实,它随着近代国际关系史向着纵深推进,对国际社会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 加强国际文化关系的研究 对其推动国际关系史发展的作用给予正确定位,有助于加深理解国际关系史的内涵和全面把握、揭示近代国际关系史演进的规律。

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中冲突与合作这一矛盾的演化与延伸,是国际关系史又一重要研究对象。世界近代时期欧美列强推行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活动是滋生战争的温床和引发战争的导因。在列强争霸矛盾尖锐异常,互不妥协退让的危急关头,如果国际体系的调节机制失效,战争就有可能发生。为了避免战争,就必须研究国际战争的生成机理和霸权主义的基本特征 研究争取和平的途径与手段 以保证人类社会平稳和谐的发展。

均势外交与遏制强权的关系。均势外交是指拥有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际势力在国际关系中共同推行的一种外交制衡机制。其目的在于抵销、分解、抑制过于强盛的大国或大国集团的力量 使列强之间的力量对比在国际关系中形成一种暂时的、静止的

均衡状态。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各大国从谋求和维护本国利益出发，在国际舞台上展开激烈的外交角逐，国与国之间时而亲善为友，又时而反目为敌。千方百计地加强自己的实力，不择手段地削弱对方，不使对方的力量超过自己，并力争形势变得对自己有利。均势外交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中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研究均势外交能使我们在纷繁变幻的近代国际关系中拨开西方各国外交施放的重重烟幕和制造的种种假象，走出外交迷宫，揭示国际关系更替、消长和变幻的规律。

四

近代国际关系史内容浩繁，头绪如麻。要稳妥阐述国际关系史的演进历程 把握正确的探索方向 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论作为研究的指南。对此，西方从事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学者采用了历史分析法、哲学分析法、心理分析法、计量分析法、法律伦理分析法、数学模型法 以及沟通论、系统论、影响论等五花八门的研究套路。这些研究方法其中虽有独到可取之处 但大多顾此失彼 不能生吞活剥拿来为我所用。我们应立足本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指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既是世界观 又是方法论 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考察国际社会问题，阐释国际关系史发展变化的规律，应体现出三个原则：

第一是客观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史观，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 对材料进行考释、鉴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不溢美 不隐恶。分析问题不受人人为的情感、愿望和成见所左右 从中引出客观存在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结论。

第二是普遍联系的原则。该原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原

则。国际关系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任何国际现象都是统一联系之中的一个成份或环节，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坚持普遍联系的原则需要做到：一要全面地看问题。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注意观察客观事物的不同侧面，分清主流和支流。二要系统地看问题。近代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逐渐形成一个大的立体网状结构，国际关系史中的各个事件和现象的普遍联系大为加强，因而对国际关系史必须作系统分析。三要区别不同国际事件、现象的联结点。客观事物是复杂的，不同的国际事件和现象都有它的特征，彼此有着不同的联结点，也就是说不能用一个标准、一种尺度来看待事物的普遍联系。四要历史地看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①。弄清研究的问题所发生的具体时间和特定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产物去研究。不能超越历史事件产生的时间和空间，用当代文明去苛求前事前人。

第三是运动发展的原则。这一原则与普遍联系的原则相依存。国际关系史中的事件、现象是在联系中产生的，并在联系中运动和发展的。国际关系史中既有合作，又有矛盾，合作和矛盾是国际关系运动和发展的表现形式，但离不开联系。坚持运动发展的原则，一要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发展联系起来。国际关系运动发展的根本基础是国际的劳动分工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生产方式的转换，都会程度不同地引起国际关系的变动。二要同阶级关系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在国际关系中，阶级不是独立的参与者，但是在阶级社会里，国际关系的参与者之间的联系、矛盾和对抗，都以不同形式反映了各国不同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各国内部阶级关系的发展变化对国际关系会产生直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4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接影响。三要考察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军事关系、文化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集团关系之间交错关系的发展与异变。

以上所述，我们在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抉择研究的方法论上与西方学者差别甚大，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对外国非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方法报以限制和排斥的态度。推动国际关系史研究是世界各国本学科同仁的共同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项研究不应当人为设置国界。尤其在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现时代国际社会两大主题的今天，要想把国际关系史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各国学者更应以开放务实的态度，加强相互交流与切磋，扬长避短，推陈出新。有鉴于此，我们对欧美学人在这一领域中所取得的新的研究方法和优秀成果，非但不予鄙视，反而应给以足够的重视和积极地加以吸收，以缩短中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水平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加快同欧美国际关系史研究接轨的步伐。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对外来的东西应加以甄别，吸取精华，剔除糟粕，杜绝食洋不化的倾向。高举国际主义旗帜，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强权政治，谋求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是我们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应体现出的中国特色。

五

前面提到，国际关系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历史现象，发端久远，早在国家出现后的古代社会，相邻国家之间最初的简单交往之始，具有象征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就已产生。当人类社会跨入近代后，完整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才得以形成。但国际关系史发展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至今还不足百年。据考证，18世纪中期之前世界历史文献和典籍中还未出现“国际关系”这个词汇，1789年杰里米·边沁在《立法原理和道义概论》中才首次使用“国际关系”这一

概念。然而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问并未很快问鼎社会科学研究的奥堂。从 18 世纪末历史又经过百年时间的演化,直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列强争夺世界的矛盾空前激化,欧洲豪强势力之间传统的政治关系发生分化与重组,形成尖锐对立的两极格局,终于把人类社会推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这才引起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和蒙受战争之害的无辜民众的深刻反思,于是国际关系史研究得到显著加强,使原已孕育中的国际关系史这门学科加速走向成熟。1916 年,首部国际关系专著——《国际关系导论》在伦敦出版发行。1919 年 5 月 30 日巴黎和会期间,英美代表为推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研究,决定设立国际关系学术研究机构。不久,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耶鲁大学国际研究所、哈佛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委员会先后成立。鉴于 1919 年 5 月 30 日对于国际关系步入正规化、学术化、专门化和机构化研究轨道具有里程碑意义,德国学者厄恩斯特·奥托·泽姆比将这一天视为国际关系这门学科的正式诞生日。

国际关系史经过近代社会 200 多年的孕育、蓄积、发展,特别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最终成为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被各国学术界所承认接受。由于国际关系研究是适应国际社会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研究国际关系史不仅可以吸收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通过历史与现实结合,弄清现实问题的来龙去脉,有效地预测未来国际局势走向和演变的结局,在各国政府决策制订对外政策和国内大政方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各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斗争中争得有利地位,因而这门学科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学术界异军突起,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得到迅猛发展。英、美成立了对外关系委员会。1919 年英国威尔士大学率先开设了国际关系讲座,设立国际关系教授职位。从 1919 年到 1926 年,美国有

40 所大学纷纷建立国际关系专业系所，迄 1931 年 美国高校共开设国际关系专业相关课程达 3700 门之多。自 30 年代起 西方主要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获得大面积丰收，大批高水平的论著陆续面世。1939 年 6 月 英国著名学者爱德华·H·卡尔出版《20 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一书 对国际关系涵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精辟的阐述。在西方国际关系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继之 布赖顿、弗兰克尔等人在这一研究领域也同样卓有建树。

30 年代后美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局面空前活跃，成就非凡，本学科一批学术拔尖、年富力强的专家脱颖而出 形成一支强大高效的专业研究梯队。其中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芝加哥大学教授汉斯·莫根索。1948 年他推出专著《国家间政治——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 作者以现实主义方法阐述国际关系 把权力政治视为国际关系的核心因素。国际关系围绕着利益—权力—实力这个偶合系统而运转 其中政治权力处于最重要的环节 权力是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和支配能力，任何国家的全部行动都是为了保持和增强权力，国际政治就是权力之争。一个国家能有效地获取权力 就能有效地获取和平。在权力斗争中 要么支配别人 要么受入支配。权力是国家利益的保证 权力又以实力作为基础。莫根索这一著作畅销全球 经久不衰 连续再版 6 次 在美国的外交决策与对外关系实践中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0 世纪 60 年代 在美国 国际关系学科研究生机蓬勃 成就斐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以前的研究水平。继莫根索之后，哈佛大学教授卡尔·多伊奇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木秀于林，独树一帜，在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上发掘了新的创意。在其 1968 年出版的代表作《国际关系分析》中提出了被称为“沟通理论”的三个研究方法：一体化论、相互依存论和博弈论 令人耳目

一新。1973 年和 1976 年他又先后出版了《国际政治和数学方法》与《政治的数学分析》广泛地运用数学原理分析国际关系中诸行为的体系、结构和特点。这一时期还有一批该学科专家、教授也分别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在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园地中苦苦耕耘，成就不凡。具有较大影响的有以查尔斯·克格莱为代表的“比较对外政策学派”有以肯尼斯·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学派”。他们构成了一个强大高效的学术研究群体，在世界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牢牢地占据着中心地位。

前苏联作为世界上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但在国际关系史研究方面落后于英、美等国。苏联对这一学科的研究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又较长时间停留在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对国际关系论述的解释与对国际问题的资料分析方面。50 年代中期，苏联的国际关系史研究才在学术界占据一席之地，取得一些成果。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葛罗米柯、赫沃斯托夫等主编的 5 卷本《外交史》。70 年代后，步入到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阶段，其研究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践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世界其他国家也对国际关系史研究作出过积极贡献。如法国勒鲁万主编的 8 卷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史入门》日本的义井博撰写的《国际关系史》等。

中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与欧美国家相比，虽起步晚，差距大，但本世纪 30~40 年代在国际问题和东方国际关系方面也取得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建国后，国际关系史这门学科开始走上有组织、有规划的系统研究和健康发展的道路。在高等学校设立国际关系专业，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和专门的高等院校，创办专业期刊。同时国际关系成为部分文科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广大专业工作者通过辛勤耕耘，奋发进取，在科研教学、培育人才、学科建设等方面收效显著。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和深化，为

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实际需要，本学科研究展现出新的时代风貌。该专业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在一些科研机构 and 高等院校相继设立。一批批高学历、高层次的专门人才纷纷加盟国际关系史研究队伍，老中青学人协同攻关，拓殖空白，国际关系史研究水平跃上一个新的高度。80年代中期以来科研硕果累累，撰写出版多卷本国际关系史以及综合性的或专题性的论著数十部，推出十多种书名相同或书名相近的专业基础教材。发表学术论文千余篇，编辑出版了文件集、论丛、译丛、资料选集、历史长编数十卷。这种努力不仅大大缩短了与欧美国家在本学科研究中的差距，而且展示了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雄厚实力与广阔前景。

六

近代国际关系史的起始点目前在学术圈内尚未达成一致共识。大多数学者倾向以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古代中世纪‘国际关系’与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分界线。这本《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开端所采用的就是这种意见。

1648年召开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它确立了主权原则为国家立国的基本原则，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构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开创了以国际会议形式解决国际争端与结束武装冲突的风气之先，在国际关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选择以上重大历史事件作为近代国际关系史开端的界标，与同一时期发生于欧洲对国际关系史发展产生巨大助推作用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时间上基本吻合。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实现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更替、转型的伟大事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更具有典型的划时代意义。世界近代史是近代国际关系史衍生的载体，近代国际关系史是世界近代历史演进中的产物。经过英国资

产阶级革命的洗礼，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及其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在英国确立，并呼唤欧洲其他封建国家政治革命的到来，从而加速了世界新旧社会形态易位的步伐。封建主义无可挽回的衰落，资本主义不可阻挡的兴盛，推动着国际市场的张扩，传统上封闭式的国际环境被打破，世界联系日益加强，近代民族主权国家开始形成，国际社会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的斗争初露端倪，这一切同时揭开了世界近代史与近代国际关系史协调发展的新篇章。

前已述及，近代国际关系史不是无源之水，它与古代中世纪社会非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有着密切的渊源联系。为此，本书首章论述了 17 世纪 40 年代以前西方世界的兴盛，作为近代国际关系史肇始的铺垫，目的是为了不断历史的联系，说明近代国际关系史是对近代以前国际关系史的继承和延扩。随后的内容从三十年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共 270 年的时间跨度里，再现的是近代国际关系史循序演进，波浪式发展的客观历史画面。

透过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历史烟云，可以看到 19 世纪中期以前欧洲主要国家在近代世界舞台上一直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直到 19 世纪晚期，美国、日本崛起之后，才打破了西欧一统天下的局面，近代国际关系史的重心开始由欧洲向北美、东亚发生有限的转移。即便如此，19 世纪后半期西欧诸国仍在国际关系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欧洲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扮演着中心角色，并非研究者人为的拨高或偏执所使然，它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实际状态，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历史事实。因为近代欧洲既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桑梓之地，又是近代产业革命的摇篮，使之拥有其他地区无可企及的领先发展优势。从而在政治制度的完备，经济实力的提升，科学技术的突破和思想文化的进步方面都远远稳居世界的排头。

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铸成了这

一个规律，即国际关系的运行重心始终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兴盛地带并存。经济实力是决定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对国际关系支配权的根本力量。谁强大谁在国际事务中就最有发言权，对国际秩序的安排就最有号召力和影响力。这也正是西欧国家为什么长期占据近代国际关系中心地位的原因所在。

资本主义最早勃兴于欧洲，给欧洲特别是给西欧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也在西欧最早培育了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扩张体制。国力得到伸张的欧洲强国先在欧洲，后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疯狂的争霸活动。由于列强的争霸活动以武力为手段，致使战争连绵不绝，成为近代国际政治中的家常便饭。因而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强盗行径构成近代国际关系史上鲜明特征之一。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 16 世纪中期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帝国衰落之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有强国在不同时期都做过称霸地区和称霸世界的美梦，它们或是单独称霸，或是两三个国家联合称霸，但它们都没能永久地、稳固地实现其称霸的野心。它们的称霸企图或是得逞一时，或是昙花一现。为什么列强称霸野心不能永久得逞？究其原因：

首先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经常改变着列强之间的实力对比，使得国际政治的操纵权总是在强国之间不断的易手，没有一个强国能保持永恒的强盛不衰。其次是几国联合称霸，在复杂的国际矛盾冲突中，由于其内部相互利益不尽一致而产生的离心作用，瓦解、抵销了列强联合称霸的力量，使其联盟不能维持长久。其三是均势外交的遏制功能。均势外交是贯穿于国际关系史中的一种外交制衡机制，它一是利用政治谈判的非战争途径限制某一国或集团力量过于强大，二是在矛盾冲突无法避免，通过战争手段解决双方利益的争端，降服决意争霸的一方。近代时期由争霸活动引起的战争厮杀无疑都是在列强之间展开的，双方都

有谋求霸权的贼心 战争的结果无论是两败俱伤 还是率先挑起战火的一方被反方所败,在客观上对列强的争霸均可起到暂时平衡的作用。其四是被征服、被奴役的国家和人民奋起武装反抗,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牵制了列强在殖民地的统治,挫败列强的争霸计划。总之,强权不得人心,称霸注定失败,是潜存于近代国际关系史中的一个铁的规律。

从三十年战争后期到拿破仑帝国倾覆这一漫长时期,欧洲大地狼烟四起,兵连祸结。主要有封建王朝之间争夺王朝利益的战争,有英、荷、法、俄、普、奥等国争夺欧洲或欧洲某一地区霸权的战争,以及它们争夺商业、航海垄断地位和海外殖民地的战争。这一时期的战争不仅规模可观,交战双方有多国参战,而且战场广异,有时在欧陆展开,有时在海上进行,有时在殖民地交火,有时在几个地区厮杀。因受列强霸权主义的制导,历次为结束战争而签订的和约大多不是为了实现和平,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而是成为战胜国划分势力范围、宰割弱小民族或落后国家的协议。

近代早期,在欧洲国家中对立与冲突最烈的是英、法两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随着其国力的攀增,海上实力急剧上升,与海上马车夫——荷兰展开雌雄之争,经过 3 次武力交锋,英国于 1674 年彻底击败荷兰,成为欧洲海域的无敌“沙皇”。从 17 世纪末叶起,英国开始挑战欧陆头号强国的法国,两国的冲突左右着欧洲大陆、海上以及殖民地局势的发展。英法的争斗成为这一时期国际关系中的矛盾焦点。经过 13 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法国遭到严重削弱,海外殖民地大片丢失,其欧陆霸权地位发生动摇,英国势力占居上风。在七年战争的决斗中,英国彻底打垮法国,确立起在欧洲乃至于世界的霸主地位。

英国在近代早期的争霸活动中逞凶斗狠,频频得分,从对外战争和海外殖民地获取的巨量财富多半转化成资本支持工业品的创

制，使其工业发展以他国无可比拟的底气和良势在欧洲鹤立鸡群，从而保证英国继 17 世纪 40 年代在政治上缔造资本主义制度独领风骚之后，18 世纪中期又在产业革命领域再拔头筹。它以扩大国际贸易并输出技术和资本的方式启动了欧洲辉煌的产业革命时代，使世界初步实现了由农业社会迈入工业社会的伟大转折。

18 世纪中期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旁落英国之手，经过半个世纪的历史蓄积和世况变迁，法国元气又复重新崛起。一代枭雄拿破仑横空出世，使得欧洲的政治天平发生严重倾斜。拿破仑帝国在平服反法势力的轮番围剿和妄图征服世界的双重动因驱使下，东征西讨，几乎把除俄国以外的欧洲大陆国家统统踩在脚下，重振昔日欧洲大陆霸主的雄风。以英、俄为首的法国宿敌纠合普、奥组成反法联盟，必欲恢复被拿破仑搅乱的欧洲政治秩序。双方经历 6 次生死搏斗，拿破仑帝国终被欧洲占优势的封建力量所摧毁。随后召开的维也纳会议使拿破仑时代以后的欧洲出现了新的格局，即由过去法国一强主宰欧陆变为以英、俄两个侧翼国家占优势的多强争霸欧洲的局面。

东欧的俄国问鼎欧洲政治、拓展海外地盘的时间迟于英国，18 世纪内俄国经过常年、多次对外用兵，先后夺取黑海、波罗的海出海口，以及获得出入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利。从 19 世纪上半期起，俄国成为闯入瓜分世界殖民地竞技场的一匹黑马，它在中近东和远东疯狂扩张，并试图以阿拉斯加为跳板将势力打入北美。在西起黑海海峡，东至北太平洋之滨的广大区域与英国南北对峙，开始了两国之间长期的正面较量，并曾为此引发了克里米亚战争。英、俄两国的争霸斗争构成了 19 世纪中期国际关系史的主题之一。

同一时期，另一对国际关系史造成震荡性影响的事件是德意志国家整合与新生的运动。这一事件改变了普鲁士长期以来作为